

亞力山大·卡斯納契夫著

思 果 譯

佛國諜影



版 出 社 版 出 一 中

佛 國 諜 影

亞力山大·卡斯納契夫著
思 果 譯

中 一 出 版 社 出 版

• 1963 •

INSIDE A SOVIET EMBASSY:

Experiences of A Russian Diplomat in Burma, by
Aleksandr Kaznacheev,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mon Wolin. published by J. B. Lippincott
Company,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opyright ©
1962 by J. B. Lippincott Company.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g Yih Publishing Company,
Hong Kong.

佛 國 諜 影

著 者：亞力山大·卡斯納契夫

譯 者：思 果

出 版 者：中 一 出 版 社

九龍彌敦道一七八號五樓

印 刷 者：僑 光 印 務 有 限 公 司

香港英皇道九五號
電話：七〇〇一四九

每冊定價港幣一元六角

引言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甘迺迪總統接見莫斯科消息報的編者，他在那出名的談話中說，國際緊張的局勢和核子戰爭的危險，都是蘇聯企圖赤化世界所引起的。他又說，如果蘇聯放棄把共產主義一國一國地推展開來，冷戰的緊張自會消失。莫斯科對這項指責憤然反唇相譏，否認其事，一面高唱和平共存與停止核子武器試驗的論調，一著赫魯曉夫就可以和羅素一同在倫敦的特拉法爾格廣場靜坐示威一樣。在西方，甘迺迪總統的聲明獲得普遍的贊同。

用邱吉爾的話來說，蘇聯是「裏在神祕中的謎」，不過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蘇聯的目標與成敗——三方面的規模都很大——不能再在鐵幕背後或柏林圍牆裏面隱藏了。不過蘇聯向它的集團邊界以外擴張的企圖產生了新的問題，使人不能不予以密切的注意。赤化的危險如何？它的戰爭戰術如何？要對付它的兇焰有什麼辦法？歷史上找不到答案，因為集權國家的新帝國主義已經發明了新的、陰險的、有效的方法了。

本書對這些問題提出有價值的報導。這是根據作者（一九五九年投奔西方）在一個莫斯科認為很頭痛的新興國家裡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列寧可能是首先看到舊帝國主義衰微已迫眉睫的政治家，他知道新獨立的國家在光榮建國過程中與過去西方的統治者為仇，因此和它們結盟是有益

的。他並不介意「最進步的」共產主義和最不進步的國家結盟，因而公然破壞馬克斯主義的格局。早於一九二〇年，蘇聯的內戰差不多要結束，經濟崩潰的痛苦仍然存在的時候，他就在巴庫召開東方民族大會。這是個騙人的大會，代表都是冒充的，不過却定了一個政策的基礎，幾十年後果實盈纍。

不過蘇聯用以征服新開發國家的方法僅僅是蘇聯對外政治總戰畧的簡化和加強方式之一。它的基本成分——是所謂「政治情報部」，隸屬國家安全警察局。本書內容充分透露這個分枝繁多、有高度技巧的情報部指揮秘密工作，滲透、腐化、破壞地方政治勢力情形；以及這個部門在某些方面穩健地把它的活動擴展到超過大使館職權的情形。

情報機構並非蘇聯發明或專利。世間強國沒有不靠組織完善的情報機構就能夠生存的，在冷戰時代尤甚。不過在蘇聯外交政策中的情報任務和西方強國外交政策中的情報任務極不相同。搜集軍事、經濟、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報，只是蘇聯情報局的次要工作；它的主要目標是顛覆現有的政治制度。要達成的計劃可長可短，以當地的情況為轉移，不過其目標是蘇聯在全世界各地的外交政策之無上宗旨。這是甘迺迪總統所說的「共產化」，也是赫魯曉夫在紐約對美國人所說的「我們要埋葬你們」的意思。

從本書所述緬甸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這一政策運用起來多麼動人。大使館一面執行經常外交任務。和緬甸政府簽訂協定、條約，另一個秘密機構却隱藏在大使館三樓，組織共產黨和其他反政

府的團體，供應軍火和經費，武裝叛變份子，并和莫斯科的安全警察局保持直接的接觸——總之，這個機構陰謀詭譎大使館所承認政府。執行這些顛覆活動的主要機構是當地的共產黨和各親共產組織（在這些組織內有理想家和腐化份子）。同時，大使館和前來訪問的蘇聯政要以及蘇聯控制下的報紙，都不斷地宣傳不干涉的態度、和平共存、各國友好相處等論調。韓國諺語云：當心笑裡藏刀。

作者在國際關係學院裡和蘇聯大使館中觀察所及，也反映出蘇聯青年一代外交家的心理，這種心理和最近消息靈通的外國遊客在蘇聯所得的印象相符。革命的精神和革命後鼓舞許多新加入共產黨的青年的早期理想已經蕩然無存（這種理想雖然粗淺，不失為真誠）。目前青年黨員大多數對革命失去了興趣，對馬、列主義厭倦，藐視一切意識形態；完全為時時流於諛諂的實用主義支配。不過和年輕一代的黨員密切地接觸以後，就可以看出他們由集權制度產生的態度是膚淺的，本書中已有所說明了。這些年輕的男女在他們心的深處，仍然是俄國人，這句話的意思是，心理上他們是俄羅斯許多世紀歷史的產品，而不是蘇聯幾十年歷史的產品。等到機會一到，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人很容易就把共產主義的教育拋開了。

命運給亞力山大·卡斯納契夫一個好機會。他起初對緬甸人的生活感到驚異，然後竟入了迷，因為照蘇聯的標準說來，其差別驚人。他在這些老實人身上第一次看到個人的自由，對誰也不用奉承，而對個人尊嚴的重視却是使生命更豐富、更幸福的因素。儘管他在反宗教的環境中長大，

他發見佛教有的倫理水準是他的國人絕不知情的。對一個蘇聯的人說來，這些簡單的真理就和上天的啓示一般。

迫使一個青年放棄他的鄉土、家庭、資歷，投身於未卜的前途，需要強烈的決心和勇氣。

西門·伍林

一九六二年一月於紐約

目次

引言	1
第一章 中選	6
第二章 「一個良好的蘇聯公民」	14
第三章 蘇聯外交人員的訓練	21
第四章 暗中的操縱	33
第五章 盧布何價	45
第六章 被囚的外交家	56
第七章 職員與職守	69
第八章 冷戰的機構	78
第九章 一矢衆的與衆矢之的	1

第十章	共產黨兄弟	85
第十一章	君子協定	101
第十二章	我所發現的 <u>緬甸</u>	111
第十三章	幫助 <u>緬甸</u> 人	120
第十四章	心理戰爭	129
第十五章	<u>蘇聯</u> 在 <u>緬甸</u> 的情報工作單位	134
第十六章	政治情報——可以無限制運用的武器	141
第十七章	我們在 <u>仰光</u> 的人	153
第十八章	單程的大街	167
第十九章	偷來的幸福	180
第二十章	抉擇	184

第一章 中 選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接到通知，說是外交部派我到緬甸的事全準備就緒了。爲這件大事我已經緊張地準備了差不多三個月；現在總算完成了。我的往事，家屬的履歷——一直追溯到我的祖父——全都徹底調查過了，成千上百的文件和特別的表格都填過了，我還曾列席兩個委員會。

我站在莫斯科蘇聯外交部大廈十六樓的一張大書桌前，桌子後面坐着東南亞司的主任幹部。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寫字。我在他面前靜靜地站着，等他叫我坐下却落了個空。最後，他頭也不抬，說道，「卡斯納契夫同志，你運氣很好，非常好。」他說得很慢。「老實說，我並沒有料到會派你。當然，你的身世很清白，你的家裡的人，樣樣都不成問題。你的學歷也好。不過——你在共產主義青年團裡的活動不夠積極，他們也沒有熱烈地推薦你。現在的青年真太不成話了！」他抬起頭來，神情很失望而憤怒。「五年前，像你這樣的青年團團員做夢也休想被派到國外去。」然後他的口氣變和氣了一些。「卡斯納契夫，你是個伶俐的人；你總算學會了緬甸話，別人想都沒有想到呢！我們需要懂得緬甸文的人。」「所以——他微微含笑說，「我恭喜你；我們派出國的只限最優秀的，在我國青年中最傑出的，俗語說『人上人』。」

我竭力保持嚴肅，我知道這樣一開頭，底下就是一大篇訓話，這種話我已經聽過五六次了，大

意是「黨和政府對你很信任，爲了共產主義最後的勝利，把你送到鬥爭的前線，對資本主義的戰爭中，在政治與意識形態兩道防線上，你將成爲我們的重要部份。」等等。

使我驚異的是這位主任幹部明明打定主意一反常情，因爲他站起身來，伸出肥大的手，遞給我一本綠色的皮面小冊子，蘇聯外交人員的護照。

「順便提一句，我們在仰光的大使館是我們在東南亞最好的大使館之一——裡面是一群忠貞幹練的同志，是有合作親善精神的人。誰也不埋怨在緬甸工作環境的艱苦。我相信你參加這個大家庭和他們一同工作，一定會有心得的。所以再會了，祝你一帆風順。」

我動身前最後三天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的蘇聯的證件計有：國內通行證、青年團團員證、軍役證、工會會員證等都要繳還有關部門。無數的親友要辭行或來送別。許多人在說再見的時候哭起來，俄國人向來是重情感的，他們簡直當我是去作最危險的旅行似地。雖然如此，所有的眼睛裡都露出艷羨的光，無數的人要我從外國帶紀念品或禮物給他們。

最後還有一道難關：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一所灰色大樓裡，由秘密警察防衛。約有二十五至三十個初次奉派出國的男女，聚在一間小辦公室內。門開時一個大塊頭氣派十足地走了進來。他的傲慢就像黨書記或秘密警察官長——「同志們，我們要和你們討論一些關於你們在外國行動的要點。請你們跟我進來，我要給你們一人一本蘇聯公民在國外行動準則。你們要好好把它讀熟，然後在那張白紙上寫下你們嚴格遵守的誓詞。你們要知道，如果不遵守的話就要受處

分的。」

一個秘書拿來一大堆小冊子，上面題着「只限內部人員閱讀」和「機密」。

蘇聯的公民在外國不許做的事開列了一張很長、很長的單子——例如不許用當地郵電寄發消息，單獨旅行時不得與外國人交談，不許進「可疑的娛樂場所」。不過還不僅僅是禁止的項目；我們還奉命把任何同事、隣居、朋友，可疑的事報告出來；自己家庭中要和好，任何摩擦都要報告給頂頭上司——等等。最後證件上簽了字。

「各位同志，」這位官員又說，「現在我再關照你們，你們要在敵視你們的環境中生活，也可以說生活在敵人間。你們人人會成爲外國情報人員，以及各式反共的人和布爾喬亞報紙的挑釁的目標，你們每犯一件錯誤都會破壞我們蘇聯的光榮。當心自己的舉動，每一秒鐘的行爲，因爲外國人拿你們來衡量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當心，隨時要警戒。」

我們在清晨抵達緬甸的海岸。下面是藍色的孟加拉灣，我多謝外交部的一位恩人，替我安排的旅程是經過歐洲的。我在羅馬、維也納流連，西歐的繁華與物質進步使我目眩五色，覺得蘇聯的生活太枯燥。只有這時我才明白我身在蘇聯之外——這是蘇聯人民最大的夢想。

我在仰光走下飛機的時候，一陣熱而濕的風吹在我臉上——好像火爐的門突然打開一樣。然後我連走帶跑進了有空氣調節的機場大廳，看見有一長列旅客，在緬甸海關人員面前站着，拿行李，護照，防疫證件給他們檢查。

一個穿白色襯衫捲着袖子的人在驢的另一端出現了。他走過這行旅客，像在找人。最後他一直向我走來，可能已經看出我是一個蘇聯人。

「卡斯納契夫，你好嗎？我是這裡的副領事。你爲什麼這樣遲？我們以爲昨天你就會來了。」然後他帶着高人一等的神氣說，「你算運氣。我們在這裡替我們的一等秘書送行，所以可以把你帶回大使館；不然你就要自己走了。把你的護照拿給我。」我把所有的證件都給了他，他毫不猶豫就衝到對面海關人員的櫃台前。他簡直熟悉透了。照蘇聯的報紙和無線電所說，我不由得不以爲緬甸是人民民主之類的國家。那一行旅客不會作聲，雖然別人用不贊成的眼光看了我們一眼。我的同胞用不高明的英語要海關人員先看我的證件。這種事總會有過的，關員一看是他就不大高興地檢查了我的文件。

我們離開那裡乘俄國汽車赴大使館。車裡兩男一女在等我們。他們微帶好奇心地把我從頭到腳看了個够；最後他們瞪着我的手提皮包。「你可會替我們帶了什麼來麼——信或者包裹？」

我說沒有，心裡大惑不解。然後他們的好奇心沒有了，對我也不起勁兒了，我們一路上什麼話也沒有說，路不平，顯得厲害。眼前景色愈來愈不動人。

在驕陽下萬里無雲，四面長着灰色矮樹，零星的棕櫚。路兩旁是簡陋的小屋，以破竹爲牆，棕葉爲頂，大輪的牛車，裸體的小兒在周圍遊戲，許多穿裙的男女，都張着大黑傘。然後看到村莊，有些像歐洲的，繞以大樹，許多樹上有花。

我正在納悶，不知道離城還有多遠，不知此身已在城中。

最後，我們到了一座大圍牆旁，牆上有巨大鐵門，牆頭嵌着碎玻璃。牆上釘了銅牌，其上用緬文寫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使館。」車夫用喇叭發出信號，一個瘦弱，穿蘇聯裝的中年婦人從門旁的小屋走出。她用盡了力氣把鐵門打開。啊，這已經是到了家的現象了；我們的車開進了院子。裡面有兩座兩層的房子、樹木、花壇、矮樹叢、燒過的草。內院的一角凌亂地晾着洗過的衣裳。我奇怪即使在這種地方，我國同胞也保存蘇聯生活不整潔的一貫作風。我總算又回到了故國。

第二章 「一個良好的蘇聯公民」

主任幹部說得對：我運氣很好，非常好，能够算是那些中選的人中的一份子。雖然，我謀了這件事，事情的演變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背景很平常，真想不到獲得這份殊榮。不過我能出國，心裡也很情願，蘇聯的人誰不想呢！

我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於莫斯科。我的最早的回憶是我的家，我和我的母親住在一間房的一角，她那時學醫。十個人住在兩間舊木屋子裡。因為地方小，我的父親不能住在裡面。他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已經是電子專家，却只能和兄弟住在一間小屋裡，遠在本城的另一邊。

我只有在週末，他的兄弟到鄉下去的時候時才能看到他。只有那時才有一張母親和我的睡床。這種毫無隱秘的生活會使某些別國的孩子極其不慣，不過在蘇聯却已見怪不怪。我當它理所當然。我甚至很快慰，因為照我的許多小伴來說，「家」只是破爛的收容所。

當然我對集體農場和史達林的大清黨這些大事全不知情。我年紀還小，不過這些事的後果在以後多年一直壓在成人和兒童的心裡。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我已經上學了。德軍起初獲勝，已打到莫斯科的郊外。我的父親奉命帶了他的研究人員撤到卡查斯坦；母親和我撤退到近烏拉爾山的一座荒城烏發。

我們在那裡嘗到慢慢餓死的滋味。母親還在學醫，但已染肺疾。我們無錢無助，又無朋友。所以在九歲我就成了討飯的乞兒。幾個月工夫我們都掙扎求生，希望却是毫無。一九四二年我們重回莫斯科，真如同奇跡出現，這時德軍對當地的威脅已解。在莫斯科我們有些親戚，母親進了醫院，不過我們兩人每天都要為生存搏鬥。這種情形直到戰爭結束，父親在一九四三年回來以後，還沒有改變多少。

從早到晚，我排在長龍裡等麵包和幾個蕃薯。一週一次，我和鄰居一同乘火車，然後步行到十二哩半以外一個小村中，拿我們的衣服換麵粉和牛油。

這段日子真難過，叫我知道生活的殘酷，最強、最機敏的人才能生存。學校裡教的書上說的雖有不同，事實却如此。戰爭還教了我一些別的：愛國，做俄羅斯民族的一份子。在每天排隊等麵包的時候，我遇到成千上萬不同的人，聽他們談話。蘇聯政府和共產黨照他們說來並不像我們在學校聽說的那樣是「受人民的愛戴和尊敬的領袖」；這些人不過是壞蛋，壓迫別人的人，殺死了千萬人，國家的不幸他們應該負責。不過我聽得最多的是：「戰前的情況再也不能恢復了。我們為了改善生活，血也流够了！你等着瞧吧；仗打完了什麼都得變。」

我只停了一年學，奇怪的是我每天排隊並沒有怎樣影響我的升班。十一歲我參加了先鋒隊——共產黨對學童的組織。這當然由不得我的。一天我們班上來了一個青年，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到了參加組織的年齡了。幾天後，我們集合在學校的禮堂裡，牆上掛了蘇聯領袖的像，赤色的旗

幟，還有電燈泡做成的「先鋒隊的營火」——這個組織的標誌。我們一體宣誓向黨，向列寧，史達林的教訓効忠；然後每人拿到一條紅領結，我們要引以爲榮地結起它來，表示我們已經參加了神聖的共產主義行列了。不過我以爲只有少數幾個人特別自豪，我却不覺得。我的短短的人生經驗已經使我成了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了，這經驗也在我身上種下了諷嘲癖的種子。整個這件事在我看來都太不值錢，太無聊。我很懂得「共產主義」、「黨」、「工人階級」這些漂亮字眼都是有名無實的標語，即使教師也不相信。

戰後我們的情況有了改良。母親身體好了，我們和父親住在一起了——三個人住一間小房。父親得到博士學位後加入了共產黨，做了科學院的一間研究試驗室的主任。但俄國人民對戰爭所抱的希望並沒有實現。相反地，史達林却在國內開始了一個新的恐怖和壓制的統治。這個統治殘酷而無法抵抗。到處傳說千百萬的人被捕，慘遭非刑，送入奴工營。人民更加害怕可怕的秘密警察，讚美史達林的歌唱得更响，不過街上大笑和高聲談話却都沒有了。我學得了有價值的教訓：大家談話時關於政府，秘密警察，或類似的事的坦白真誠程度，要看關係的深淺而定。我們必須學會察言觀色，隨機應變。一個蘇聯的好公民應該是個好演員。

一般人的恐懼與絕望漸漸侵進我的心靈，雖然我還年青，不知道爲什麼怕，和怕誰。一天我懂了一——差不多懂了。我那年十五歲，在第七班讀書，這年春天某日，一個同學和我約好去普希金博物院參觀。我們說定克里姆林宮對面聚會。我按時到了那裡去等他。我的朋友沒有來，所以我